

# 永川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九辑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永川市委员会  
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 永川文史资料选辑

## 第十九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永川市委员会

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2003年12月

顾 问： 肖坤华  
主 编： 吴平金  
责任编辑： 伍济发  
主 审： 张万瑞  
审 稿： 蒋开友 蒋廷举 吴平江  
周明扬 屈景益 胡尚知  
校 对： 伍济发 周明扬

封 面： 重庆永川光华世纪广场

# 目 录

|                |              |
|----------------|--------------|
| 彭德怀元帅的永川之行     | 张鸣羊 (1)      |
| 杜攻外交生涯片断       | 杜家翎 唐良芬 (7)  |
| 曾被湮没的丰碑        |              |
| ——记重庆公安系统第一位烈士 | 罗敦才 (16)     |
| 黄大遭传略          | 黄家婕 (24)     |
| 永川民革组织的建立及发展   | 刘芳 刘莉 (28)   |
| 解放初松溉保卫战纪实     | 夏登瀛 (31)     |
| 永川县建国初期的镇反运动   | 罗敦才 (36)     |
| 参加永川农村土地改革的回忆  | 龙安中 (48)     |
| 永远坚信共产党        |              |
| ——错划右派志不移      | 龙安中 (52)     |
| 书生从商记          | 余天潢 (61)     |
| 旧事钩沉（续一）       | 龙 飞 (73)     |
| 参与“四川粮民借谷索债团”  |              |
| 反对四川省主席张群简况    | 邹隐樵 (77)     |
| 回忆永川的电力发展和普及应用 | 阳正明 唐继林 (87) |

|                   |     |       |       |
|-------------------|-----|-------|-------|
| 永川城郊区溪河养鱼纪实       | 唐继林 | (90)  |       |
| 抗战时期成渝公路乘车难       | 蒋廷举 | (95)  |       |
|                   |     |       |       |
| 永川市川剧艺术团十年回顾      | 徐正经 | (100) |       |
| 景先圣兮，期后进          |     |       |       |
| ——景圣中学创建大事记       | 徐正经 | (109) |       |
| 殷钟道与三教“弘化国学专修院”述略 | 彭在村 | (124) |       |
| 陈炳常同志事略           | 彭万国 | (130) |       |
| 满怀敬意悼炳常           | 陈遵礼 | (134) |       |
| 名人轶事（待续）          | 余天潢 | (140) |       |
|                   |     |       |       |
| 老一代影人岳路           |     |       |       |
| 话剧界元老陈治策          |     |       |       |
| 植根民间的著名歌手叶绍清      | 熊昆信 | (145) |       |
|                   |     |       |       |
| 永川《渝西光华世纪广场赋》小引   | 王孟威 | 陈遵礼   | (148) |
| 永川的江西会馆           | 刘芳  | (152) |       |
| 永川老城墙琐记           | 王昌文 | (156) |       |
| 寻踪宋代经学家陈鹏飞        | 王昌文 | (159) |       |
| 重庆市历史文化名镇——松溉镇    | 刘炎文 | (162) |       |
|                   |     |       |       |
| 我了解的松溉叫化营         | 龙安中 | (169) |       |

## 彭德怀元帅的永川之行

张鸣羊

在那“文化大革命”的黑风恶浪即将袭来的1966年4月，被调为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的彭德怀元帅，专程来到永川花果山煤矿进行“亦工亦农轮换工制度”的考察。

在到来之前，中共四川省委通知（大意）：一、第一把手有意识回避；二、对彭的言行作好记录；三、事后写出报告。中共江津地委根据省委的通知精神，安排由分管工业的地委副书记江风接待、地委工交部秘书崔德普作记录，并事后整理上报。在江风等人的陪同下，彭帅于4月26、27日赴永川花果山煤矿召开了厂社干部、老工人、轮换工人及职工家属等一系列座谈会，广泛听取意见。彭帅衣着简朴，平易近人，秉性豪爽，和蔼可亲，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会议有问有答，无拘无虑，开得十分活跃。凡当年参加座谈的干部、群众，莫不记忆犹新，对彭帅深寄怀念之情。

彭帅那种追求真理，为共产主义事业孜孜不倦的革命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永川花果山煤矿的亦工亦农、轮换工制度”试点，是一种有利于逐步缩小和消灭“三个差别”的尝试。这是一个多么有吸引力的课题啊！是的，我们共产党人就是为消灭“三个差别”、实现共产主义而不惜奋斗终身的。作为出生入死、南征北战、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近半个世纪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彭德怀元帅，虽然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蒙冤受屈，被加上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罪名，受到错误的批判

和极不公正的对待，但彭帅毫不计较个人得失，当他在西南局重庆基本建设政治工作会议上听到花果山煤矿矿长关于“亦工亦农”问题的发言后，兴致勃勃的将“发言材料看了几次”，这次又专程来永川“搜集些材料”，“好作些研究”。在座谈会上，当矿里负责同志谈到推行亦工亦农劳动和试行厂社结合，有利于缩小以致消灭“三个差别”时，彭帅说：“马克思讲了共产主义要消灭三个差别，但他没有想出办法来，列宁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他临死前虽然感觉到了也没有解决，在毛泽东时代才解决了，提出了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不从制度上根本的改变，三个差别是消灭不了的。”他肯定了“亦工亦农、厂社结合，是消灭三个差别的方向，不但可以给国家减少多少的负担，亦工亦农工人是就地扎根不带家属进厂，而且厂里的职工家属还可下乡，工厂的福利设施就可减少，只有少数职员的家属在工厂，使原来是消费者，由国家供应口粮的，也变为生产者。”但，消灭“三个差别”谈何容易啊！所以彭帅说：“我在省里看到一个材料，社会主义搞了这么多年了，三个差别消灭得怎样呢？不但没有缩小，而且扩大了，苏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更是扩大了。”“你们说亦工亦农就消灭了三个差别，这与我的认识还不一样，我想是缩小了一点工农差别，因为农村一个农民一年收入的钱才四、五十元，你们一个月工资二十五元。加上津贴（并不津贴）十元，就是三十五元。比较起来相差还很远啦！搞亦工亦农只是缩小了一点，苏联搞社会主义明年就是五十年了，工农差别还没有消灭。”

彭帅的不唯书、不唯上，深入调查研究的求实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彭帅自1965年11月调到西南局建委工作以来，在不到半年的时间中，经常深入工厂、农村进行调查研究，比较大的活动就有三次：第一次是到重庆、广安、南充、自贡、威远

等地，主要调查了解了五机部的三〇八、三三八厂及自贡地区的天然气；第二次是到成昆北段和攀枝花，调查了解了铁路和钢铁基地的建设；第三次是到宜宾、珙县、泸州、永川等地，调查了解了芙蓉煤矿，特别是永川花果山煤矿的亦工亦农、厂社结合试点；随后顺道又去了大足县，调查了解农业生产、小五金生产以及文物工作等情况，彭帅每到一个地方调查，必深入基层，召开基层干部、群众座谈会。他在花果山煤矿不但要矿长介绍，更找工人座谈，不但调查在厂的亦工亦农工人，也调查轮换回农村的老工人和工人家属，不但关心工业生产，也关心农业生产，不但听取正面意见，更虚心听取反面意见。当他听到“公社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青年可以作为轮换工”时，他关切地问“假设每年有百分之三十到矿作轮换工，对农业生产有没有影响？我们要吸取五八年大跃进的教训，不能把农业劳动力抽多了，使农业生产受到影响。”当他听到矿里负责同志谈到“在未实行轮换工前，职工平均年龄为四十岁。轮换后，现在职工（包括干部）平均年龄为二十八岁”时，彭帅说：“农村搞生产抢栽抢种，与旱灾作斗争需要青年，矿山也要青年，你们搞厂社结合的工农公社的青年劳动力能解决矿里轮换工的需要吗？”接着又问：“他们轮换进厂时间五至七年对身体健康影响怎样？”他要求厂、社的负责同志认真思索这些问题。当在座谈会上谈到煤炭生产中的一些问题时，彭帅强调说：“煤炭是基础工业，它上不去，其它工业也难于上去，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抓好基础工业。1959年我住在上海招待所，陈云同志也在那里。陈云同志当时问我，老彭你看今年一千万吨钢铁能否上去？我反问说，你的看法呢？陈云同志说，我看不行，现在煤炭在吃老本。那时我不懂煤炭吃老本，现在懂了，基础工业上不去，就会影响其它工业失调。”说到这里，彭帅列举了大同的例子，他说，“那一年不是大同发生问题吗？”，

这就是因为失调嘛！国民经济的发展总是按计划、有比例地发展，这是规律，离开了规律就会比例失调。”彭帅在老工人座谈会上，一再动员他们对亦工亦农轮换制提反面意见，看这个制度有些什么问题和缺点。当陪同前往的地委工交部主任曹新民谈到“厂社结合，是坚持两种所有制”时，彭帅说：“五八年成立公社不成熟，就是混淆和打乱了两种所有制，如鸡、鸭、鹅……等都归了集体。工农联盟问题，列宁讲过必须建立在互利的基础上。”彭帅视察花果山煤矿后回到永川，下榻地委招待所时，对地委的同志说：“办任何事情都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从实际出发，讲求实效，不能弄虚作假，1958年我回老家，两个弟媳都欺骗我，一个说稻子亩产一千斤，我不信。另一个说，亩产一千一百斤。第二年，我又回老家去，结果是亩产三百斤，连自己家里人都说假话，这不是浮夸是什么？这种浮夸风实在不好。”

彭帅的严于律己，清正廉明，与群众同甘共苦的高贵品质，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彭帅身着青布衣衫，无烟酒嗜好，在花果山煤矿吃了两餐中午饭，矿里出自对他的爱戴。在饭菜安排上比一般客餐稍好一些，他多次打招呼，严肃地对矿的领导说：“搞这么好的伙食太特殊了，是个浪费，同职工们一样吃伙食，不是很好吗！领导者不能只管自己吃好，要首先让群众吃好。”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美德，多么令人钦佩啊！曾经当过四年煤窑童工的彭德怀同志，对煤矿、对煤矿工人有深厚的感情。他在花果山煤矿深入到井口、运输场地、工人宿舍、职工家属住宅和厨房等地亲切交谈，询问生产安全、工人生活和身体健康情况，问寒问暖，挚情感人。彭帅在见到矿里轮换退下来休息的老工人时，一再亲切地问：“你们回去的生活怎样？有什么困难？”当老工人回答“没有什么困难”时，彭帅说：“有困难可以反映，祝愿你们好好安度晚年！”并说：“今天找你们来

座谈，耽误了你们一天的工分，我给你们解决。”被在座的地委和矿里的负责同志谢绝了，老工人也坚持不要，说“这一天工分没有什么。”工人走后，彭帅又提出，“给他们每人一块钱”，也被矿里同志谢绝了。在几次座谈会上，彭帅都叫他的秘书买了几包香烟来招待工人，并问工人：蒋介石要打回来，你们怕不怕？工人们都异口同声地回答说：不怕，有了共产党、毛主席我们才翻了身，我们不让蒋介石打回来，他回来就糟了。共产党、毛主席英明领导我们革命得来的江山，我们要坚决保住。这时，彭帅满意地哈哈大笑！

彭帅高瞻远瞩，极端的关心着党和国家大事。在4月27日晚上，当地委副书记江风向他谈到当前农业抗旱和今、县工业生产情况后，彭帅说：“备战、备荒、为人民是毛泽东思想，这口号是对的。必须搞备战，美帝国主义在越南的炮口是对着我们的！备荒，这也是对的，通过两三年的努力每个农民能不能够储备八个月到一年的口粮？主席在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到现在已经十年了，那个时候提出工业分布投资没有很好研究，原来以投资额的百分之九十投入内地，百分之十投入沿海，没有很好执行。现在看，十大关系更有现实意义了。”彭帅又说：“印尼是个问题，他与中国1927年一样，当然也有不同。1927年的时候，蒋介石他举着革命的旗帜，‘四·一二’开始大屠杀，把收复的租界又交给了帝国主义，苏哈托与蒋介石一样，杀人杀了五十万，比蒋介石‘四·一二’杀的还多。但那里的人民是要革命的。蒋介石杀人并没有把中国革命杀掉，杀了以后中国共产党没有地方开会，就跑到苏联去开会，后来又组织了游击队，慢慢扩大了革命。”

彭德怀元帅的永川之行，却遭到再一次的歪曲、中伤、打击，既有三条监视性的“通知”于前（还布置参加座谈的人只准谈哪

些，不准谈哪些），又有写黑材料告黑状于后。西南局建委办公室于1966年5月31日写的《关于彭德怀同志半年来的主要情况简报》，给彭帅的永川之行，扣上“对主席心怀不满”；“继续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有意找缺点、挑毛病”；“仍然是伪君子的一套手法，到处施行小恩小惠”等帽子，给对彭德怀元帅的迫害升级提供黑炮弹。

彭德怀元帅的永川之行，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到基层调查研究。他的光辉形象，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也永远活在永川花果山煤矿老工人的心中！

## 杜攻外交生涯片断

杜家翎 唐良芬

编者按：杜攻，永川籍人。曾刊出其夫人周青《马可·波罗故乡的中国大使》（12辑），以及其弟杜家翎《哀悼大哥杜攻》（9辑）等文。今再刊一篇，对这位永川籍的中国外交官生平事迹，以资补充。

### 在“政研室”工作的日子

翻拣1983年3月28日大哥杜攻的信，信中说，他从驻菲律宾使馆回国后，被部里分配到国际司工作。具体工作是分管南南的发展与合作的研究等，并去印度出席会议。回国后又改调到外交部办公厅任综合研究组组长。此时，他在驻菲使馆期间有两年未休假。按干部司驻外干部休假办法的规定，有二十天的假期。体假地在北戴河海滨，在大海、蓝天、白云和碧波、沙滩间度假，恢复两年来紧张的身体。但不到一周部里又通知：“另有重要工作安排急回……”。这时我国改革开放工作从经济——深圳特区——到政治、外交等领域已全面展开。外交工作也必须适应新形势的发展，打开“文革”期中的封闭局面。经外交部党委报中央书记处批准，将综合研究组改为政策研究室，并任命杜攻为该室主任。从组长到主任为时仅二十一天。

杜攻名为主任，实只有他一人。经向常务副部长韩念龙请

示：“是光杆主任，咋办？”韩对周南（当时是部长助理）和杜攻说：“你们可去各业务司选人，报部批……”。当恳辞再三无用后，从各司中调来几位“秀才尖子”共8人组成一个新班子。

工作刚起步，有两位“秀才”又被抽去为原常务副部长、驻苏大使刘晓写回忆录；另一位是为即将召开的六届人大会议写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国际部分的材料；还有一位因生病需治疗。一人顶几人的工作干，他的确太紧张、太辛苦了。

重读这已被尘封了整整二十年的信，使我回忆起很多、很多……。

从他上任开始，就顶着极大的工作压力，为党的外交政策研究努力、辛苦的工作。从打开封闭到走向世界，在政策研究和制定策略、路线等部里要求都很高、很严。外交政策研究工作是为党中央提供决策研究的“智囊”与“思想库”的工作，是丝毫马虎不得的大事。一旦失误会影响极大，为党在外交工作上带来损失。这是一件复杂而且牵涉极多的繁复工作。首先，党中央与邓小平同志的外交政策、方针、路线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既要善于观察又要灵活大胆；既要“韬光养晦”又要细心观察，为党的外交工作打开新的局面。作为政研室主任的大哥身上的担子有多大、多重？但他对此工作有信心、智慧和胆略。因为这是遵循党中央、邓小平同志的外交战略的指示进行工作的。再有，正因为人手少、担子重，必须团结好几位“秀才”，搞好五湖四海，与这些同志一起共同搞好这一工作。

政研室是一个“权力核心”的部门。每日所看阅的电文太多。他在驻缅、驻菲使馆的工作多为双边或周边关系的工作，其视野面和经验与接触面较窄，属双边问题居多。而政研室收到来自世界各地使馆的文件、电函太多。接触的面是世界性的——覆盖全球，骤然看全世界的东西，既感“五光十色”又感到应接不暇……

满脑子是电文。不仅要看，而且要写，弦绷得太紧，感到太忙太累了。

由于工作量大，担子又重，这是一项“敏感性”极强的工作，就不能与外人打交道了。因为外国人一了解这项工作，必然如蚊附腥，前来纠缠不休。有时驻京的使馆在请柬上又加上 H·E（即 His Excellency 的缩写，意为“阁下”）。他对此小心应付，婉言谢辞，未敢越雷池一步。因为生硬谢绝则会有失礼节之嫌，影响友好邦交之故也。

就在此时，政研室又新到了两位得力的助手。一位是刘山（后为驻欧共体大使兼卢森堡大使），一位是詹世亮（后为驻埃及大使），减轻了不少压力，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从 1983 年到 1986 年 9 月 16 日，他在外交部政策研究室工作了三年多。局面打开了，工作运转正常了。这时，得到中央组织部和部党委的通知：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决定任命杜攻为驻意大利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任命经人大常委会通过，杨尚昆主席颁发了任命书，一切就绪。并在《人民日报》上刊出任命的消息，时间是 1985 年 10 月。可问题又来了。主管政研室的周南副部长正全力以赴抓中英香港问题的谈判，工作紧，分身不得，不放大哥动身。他力陈去意赴任之前，必须去西欧司为赴意作准备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周南说：“我这里也有困难，你这样能团结五湖四海又精于政策、勤恳工作的同志，在人手不够的时候调离，工作会受影响的。等有继任的人到职的时候再走……”这样，他又被留下，作为“双头衔”，成了“人质”。

1985 年 10 月 24 日，驻京的各国中的部分大使、参赞和夫人应外交部邀请去西安参观。部里决定由杜攻陪同。他陪使节和夫人们去参观也得不到清闲。因为还有一个任务是为当地干部和高等院校的师生，作两场外交政策和国际形势的报告。本拟推辞，

但领导上说，原已在北京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作过报告，此行可不必推却了。作国际形势的报告任务可不轻，为该报告准备了三天。到西安后，参观的情趣也没有了。不过，这次给了他“借乘飞机去西安的机会借‘机’赴任了。”事后，果然如此。

结果，他返京后迟至1986年3月初，才启程与大嫂（周青）一道赴任。大嫂驻意大利大使馆政务参赞。他当年已57岁，坐上了“末班车”。

### 访日会谈纪实

1990年5月29日，大哥杜攻被任命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兼党委书记）。与此同时，又被任命为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副会长（后称亚太经合会。名誉会长为荣毅仁、会长为李鹿野、副会长为经叔平等10人组成。并挂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以上的任命，是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圈定，同时还被任命为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1990年10月14—23日，应日本外务省国际问题研究所理事长松永信雄之邀，率8人代表团赴日参加第五次中日国际问题讨论会。与日方共讨论了五个半天（上午会谈、下午休息）。题目主要是苏联和东欧剧变后的世纪战略格局、亚太地区的政治与经济形势。

“这是一次极重要的讨论会”。由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是二战后国际形势发生最深刻变化的时期。各国决策人、“思想库”的专家学者国际会晤频繁。日本邀请的意图是借以试探我国对国际问题的看法等等。

与日方会谈的对手是松永信雄。此人在日本声望高，已67岁。在海部俊树上台任首相后两次请其出任外相不就，是日本外交政策的高级顾问，任理事长前曾任副外相与驻美大使等职。这

是与日方第一次讨论，事前必需作好准备工作，为此，国庆节三天假日也变成工作日了。同日方国际问题研究所讨论之中、之后，会见了外务省审议官（第二副部长）。原说是礼节性拜会，实际上是实质性谈话，主要听取中方对日苏关系的前景看法。

随后，与日本防卫厅属下的和平与安全保障研究所讨论。这些专家是着便服的军人，军衔为少将。坐的姿式与电影中看见的日本皇军差不多，挺直、双手放置在大腿上部。之后，同日本外务省情报调查局（相当于我国外交部政研室）局长谈亚太形势。

其他讨论，是与松永轮流当主席（日文叫议长）。听专家发言后，与局长主谈。然后相互提问讨论。虽没有什么唇枪舌战之类，但彼此观点都十分明确，气氛也正常。

此外，还同势大力强（通产省为背景）的亚洲经济研究所讨论了海湾局势。礼节性拜会了“野村证券研究机构”，和日本内阁的“综合开发研究所”会谈。以上是在东京的活动。从活动之多，可以想见劳累的程度。

随后，代表团一行离东京乘“新干线”（高速火车）去仙台（瞻仰了鲁迅遗物与纪念碑）过夜。次晨换飞机去北海道札幌，在札幌除与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座谈和弗需泽研究中心午餐外，主要为游览。

北海道游览和参观的地方较多。因离“北方四岛”只一水之遥，去者不多（因为军事设施），邀代表团去是一种较高的“礼遇”。可惜会谈后精力不济，只去一处就告辞谢却了。次日凌晨乘机返京。回国后就生病，医生嘱咐需服药休息。

这次访日会谈，通过广泛接触、交流，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今日本的作法，不仅是想成为经济大国，具有实力经济的国家；还想成为政治大国，正朝这个方向努力……

他先后曾六次访问日本，对这个“一衣带水”的国家较熟悉，

了解得也较详细、全面。访日会谈是他外交生涯的一个重要部分。

从1990年3月到1993年3月，他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整整三年，病逝于任所。外交部党委、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党委在讣告文中写道：

“杜攻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外交战士、杰出的国际问题研究专家……”由于他生前的级别、职位，安葬于八宝山公墓。碑石两侧镌刻有：“聪睿精博，诚真儒雅”八个大字。这是对他一生真实写照和评价。

在他病重前三天，不辞辛劳带病为一位在国研所的老同志解决困难，亲自写信又四处奔走忙碌。结果老同志的住房解决了，从此他却永远倒下了。

### 对家乡人的接见

大哥杜攻于1946年以西语系第二名的高分录取于北京大学。因四川大学录取通知早于北大，先去川大交了学费后才获北大通知，因此于1947年才去北大入学。他离永川时才十八岁。以后，曾于1960、1963年因处理伯父丧事、回国休假返永川两次。前一次是在“自然灾害”时期为时几天；后一次返永是路过短暂停留，时间不足24小时！因此与家乡人极难、极少见面。下面记叙在他生前接见过的几人。

提到与家乡人的接见，不得不涉及原永川县副县长分管经委的杨国伦和经委主任李永远。1987年2月9日，他俩致函与我联系。函称，听说贵兄任中国驻意大利大使，感到十分欣慰。永川县同意与意大利布拉伊沥青股份公司防水沥青毡厂合作。意方占25%股份，技术和设备都由该公司提供。为此，请杜攻大使帮助永川了解以下事情，为谈判作好预先准备。